

江南城市与社会研究丛书

陈国灿◎主编

7—10 世纪 苏州发展研究

刘 丽◎著

STUDY OF DEVELOPMENT OF SOOCHOW
BETWEEN 7th AND 10th CENTURIES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本书系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立项资助课题

江南城市与社会研究丛书

陈国灿 主编

7—10 世纪 苏州发展研究

刘 丽 著

STUDY OF DEVELOPMENT OF SOOCHOW
BETWEEN 7th AND 10th CENTURIES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7—10 世纪苏州发展研究 / 刘丽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12

(《江南城市与社会研究丛书》陈国灿主编)

ISBN 978 - 7 - 5161 - 2375 - 1

I. ①7… II. ①刘… III. ①经济史 - 研究 - 苏州市 - 隋唐时代 - 五代 (907—960) IV. ①F129.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61255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任 明

责任校对 吕 宏

责任印制 * 建 书 *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0.75

插 页 2

字 数 346 千字

定 价 5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 序

《江南城市与社会研究丛书》是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有关研究项目的系列成果，目的在于从城市与社会的视角来认识江南区域文明和文化的发展演变及其内在特质与基本特征，推动江南文化研究学科领域的拓展和理论体系的深化。

—

“江南”是一个兼具地理和人文意蕴的空间概念。从最初的自然区域指称，到后来的多重文化符号，江南的具体地理范围因时而异，其所标识的人文社会内含也处于不断变化之中。

历史上，江南作为一个自然地理概念在先秦时就已出现。《左传》宣公十二年（公元前497）载，楚军围郑，郑伯肉袒牵牛请降，谓楚君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怀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听！其俘诸江南，以实海滨，亦唯命。”这里郑伯所说的“江南”，是指楚国南部地区。春秋时，楚国兼跨长江中游南北，江以南即泛称“江南”。清代学者高士奇考证说：“自荆州以南，皆楚所谓江南也。”^①到战国时期，随着楚国势力的东扩，“江南”的地域范围也不断扩大，进而用来泛指今长江中下游以南的广大区域，并为秦汉时期的人们所沿用。司马迁《史记》和班固《汉书》有不少这方面的例证。如《史记》卷一《五帝本纪》：“（舜）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嶷，是为零陵。”同书卷二《夏本纪》：“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同书卷六《秦始皇本纪》：“王翦遂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会稽郡。”《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今之

^① 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卷八《楚上》，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会稽、九江、丹阳、豫章、庐江、广陵、六安、临淮郡，尽吴分也。……江南卑湿，丈夫多夭。”

值得注意的是，秦汉时期的“江南”已被赋予经济地理和文化地理的某些意涵。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根据经济状况和文化习俗的不同，将当时全国划分为四大区域，其中之一便是泛称为“楚越之地”和“江淮以南”的江南：“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眚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汉书·地理志》亦有类似描述：“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蓏蠃蛤，食物常足。故眚窳偷生，而亡积聚，饮食还给，不忧冻饿，亦亡千金之家。”

汉末以降，北方持续大乱，而南方地区相对较为安定，由此引发大规模的“北人南徙”浪潮。特别是长江下游地区，大量人口的涌入，加上六朝历代政权的积极开发，经济和文化获得长足的发展。于是，人们开始用“江南”来指称这一区域，并与“江东”、“江左”等名称一起混用。如《三国志》卷一三《华歆传》注引华峤《谱叙》载，汉魏之际，“四方贤士大夫避地江南者甚众”。同书卷一《武帝纪》载：“孙策受袁术使渡江，数年间遂有江东。”《晋书》卷六五《王导传》载：“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这里提到的“江东”、“江左”之类的称呼，是与长江下游的河道走向有关。因为长江在今江西九江至江苏南京段呈西南——东北流向，长江下游地区位于此段河道的东部，故称“江东”；从中原角度看，长江下游又位于此河道的左边，故称“江左”。

唐王朝建立后，为了加强对各地监察，将全国划分为十个区域，称为“道”。其中的江南道，包括了西起今贵州东北部、东至大海的广大区域。当然，这种区划主要是依据自然地理特点。盛唐以降，对江南道的分置才较多地考虑到社会经济发达的地域特征。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江南道分为江南东道、江南西道和黔中道三部分。其中，江南东道的范围包括今浙江、福建全部和江苏南部以及安徽南部的部分地区；江南西道的范围包括今江西、湖南全部和湖北南部以及安徽南部的部分地区。中唐时期，江南东道又进一步划分为浙西、浙东、宣歙、福建四个观察使辖区。

进入两宋时期,江南所指又趋于多样化和模糊化。有时是指江南东路(今江西东北部、安徽南部和江苏南京地区)和西路(今江西大部);有时泛指江南东、西路和两浙路(南宋时分两浙东路和西路,今江苏南部和上海、浙江),合称“江浙”。如宋人虞传谈到两淮地区的粮食生产情况时说:“大率淮田百亩,不及江浙十亩。”^①庄绰谈到南宋初北人南迁的情况时说:“建炎之后,江浙、湖湘、闽广,西北流寓之人遍满。”^②正是在此基础上,元朝所设的浙江行省,其辖域包括今浙江、上海全部,安徽南部和江苏南部,以及江西部分地区,一度还包括福建大部。

明清时期至近代,江南所指呈两极化趋向。一方面,就地域观念而言,用来泛指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地区。如明代地理学家王士性在所著《广志绎》卷四《江南诸省》中,将浙江、江西、湖广、广东等省均归入江南范围。另一方面,就经济和文化观念而言,则大多是指位于今江苏南部、上海和浙江北部的所谓“八府一州”,即南京(江宁)、镇江、常州、苏州、松江、嘉兴、湖州、杭州等府和由苏州府分置的太仓州。近代以降,更是缩小到镇江以东的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也就是太湖流域。^③

由于“江南”所指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语境下有着很大的不同,故当代学者对江南地域空间的诠释也是多种多样。大致说来,主要有三种地域概念:一是所谓的“大江南”,泛指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地区,有时甚至包括长江上游部分地区;^④二是所谓的“中江南”,泛指长江下游地区;^⑤三是所谓的“小江南”,泛指以太湖流域为核心的长江三角洲及周

① 虞传:《白尊堂集》卷八《使北回上展札子》,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庄绰:《鸡肋编》卷上《各地食货习性》,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36页。

③ 周振鹤:《释“江南”》,《中华文史文化论丛》第49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④ 如黄今言《秦汉江南经济述略》(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所说的江南,包括长江以南和岭南以北的广大区域,还涉及今四川部分区域。

⑤ 如(日)中村圭尔《六朝江南地域史研究》(东京汲古书院2006年版)、张剑光《唐代江南工商业布局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日)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陈国灿《宋代江南城市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版)、从翰香《论明代江南地区的人口密集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3期)等均采此义。

边地区。^① 基于中外学界的认识,考虑到城市和社会发展的地域性,本书之“江南”,以长江下游为视野,以环太湖流域的长三角为核心区域。

二

城市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是一定生产力条件下合经济、政治、文化、地理等因素于一体的社会综合中心。相对于乡村社会的孤立性和分散性,城市具有人口分布的密聚性、经济形态的非农业性、社会结构的复杂性、劳动职业的多样性和居民生活的丰富性等特点,因而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更深刻地反映出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社会发展的既有水平、基本特点和演进趋向。

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江南有着特殊的地位。它不仅是我国古代城市的重要发源地,而且在很长的时期里引领了全国城市的发展方向。直到今天,在现代化的城市建设和城市化进程中,江南地区依然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从古今历史演变的角度讲,我们可以将江南城市和社会的发展进程划分为先秦、汉唐、宋元、明清和近代以降几个阶段,每个阶段特定的区域文明状况和社会环境,造就了江南城市的不同形态和特色。

先秦是江南地区城市的起源和产生期。有学者指出,探讨城市的起源,“必须追溯到其最早的形态,不论这些形态在时间、空间和文化上距离已被发现的第一批人类文化丘有多么遥远。须知,远在城市产生之前,就已经有了小村落、圣祠和村镇;而在村庄之前则早已有了宿营地、贮物场、洞穴及石冢;而在所有这些形式产生之前,则早已有了某些社会生活倾向——这显然是人类同许多其他动物物种所共有的倾向。”^② 江南地区城市的源起,也可以追溯到距今 5000—4000 年的良渚文化时期。按照部

① 如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刘石吉《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等均以明清时期的南京(江宁)、镇江、常州、苏州、松江、嘉兴、湖州、杭州等八府和太仓州来界定江南地区;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徐茂明《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1368—1911 年)》(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版)等缩小到环太湖地区的苏州、松江、常州、杭州、嘉兴、湖州、杭州、太仓六府一州之地;吴仁安《明清江南望族与社会经济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包伟民主编《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知识出版社 1998 年版)等则扩大到浙东宁绍等地区。

② (美)刘易斯·芒福特著,倪文彦、宋俊岭译:《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 页。

分学者的观点,“在良渚文化中晚期,应已形成共同的地域,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文化,共同的信仰和习俗,共同的经济基础”,“可能已进入‘部落王国’时代,是‘原始的国家’或‘形成中国家’”。^①有学者进一步断定:“良渚文化时的礼制和大型礼仪性建筑及城市都已产生。”^②尽管将良渚文化时代的中心聚落视为城市似模糊了原始古城与城市之间的内在差异,但良渚古城从某意义上折射出古代城市文明的曙光。正是基于这种深厚的历史基础,春秋中期以降,随着吴、越两国的崛起,江南地区经历了历史上第一次社会开发热潮,经济和文化发展获得显著发展,以吴国都城姑苏和越国都城山阴为代表的城市由此产生。

汉唐是江南地区早期郡县城市体系的确立和发展期。秦灭六国后,在全国范围全面推行郡县制,由此开启了以各级行政中心为依托的郡县城市时代。不过,在秦汉的大部分时间里,江南地区的社会开发一直较为滞缓,与同期北方中原地区相比,明显处于落后状态,部分地方由于人口外迁,甚至呈现出“得其地,不可郡县”^③的荒蛮景象。从东汉中期起,尤其是汉末以降,随着北方人口的大量南迁,加上立国于东南的六朝诸政权的重视,江南地区经历了空前规模的开发热潮,郡县城市的数量大幅度增加,逐渐形成了以都城建康(建业)为核心的区域城市体系。史称,建康城“小人率多商贩,君子资于官禄,市廛列肆埒于二京,人杂五方。”^④据《金陵记》记载,南朝萧梁时,建康城中居民一度多达“二十八万余户”。进入隋唐五代时期,江南社会持续发展,城市发展也达到一个新的水平。特别杭州和苏州,不仅是当时江南地区的两大中心城市,也是此期南方城市的典型代表。时人李华描述杭州说:“水牵卉服,陆控山夷,骈橈二十里,开肆三万室。”^⑤诗人白居易亦对苏州赞叹有加:“当今国用,多出江南。江南诸州,苏为最大,兵数不少,税额至多。”^⑥

宋元是江南地区传统城市的转型和跃升期。这一时期,随着全国经济和文化重心南移过程的基本完成,江南全面跻身城市发达区域行列,开始

① 车广锦:《良渚文化玉琮纹饰探析》,《东南文化》1987年第3期。

② 林华东:《良渚文化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89页。

③ 《汉书》卷六四上《严助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

④ 《隋书》卷三一《地理志下》,中华书局1985年版。

⑤ 李华:《杭州刺史厅壁记》,《全唐文》卷三一六,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206页。

⑥ 白居易:《苏州刺史谢上表》,《全唐文》卷六六六,第6774页。

引领城市的发展方向。一方面,城市形态发生重大变化,日益突破原有政治和军事性所构成的限制,经济、社会和文化功能显然增强;另一方面,以杭州(临安)为核心的新的区域城市体系,呈现出诸如综合型、商贸型、港口型等多样化的城市类型,以及包括基层城市、地方中心城市、跨地区中心城市和区域中心城市等不同层次的地域城市结构。与此同时,在广大乡村地区,各种市镇大量兴起。据不完全统计,到南宋时期,位于江南的两浙东路和西路仅至今尚有史可考的市镇就有 600 多处。^① 市镇属于正在形成中的新型经济都市,它与州县城市结合,构成了超越州县体制的城镇体系。

明清是江南地区传统城市发展的成熟期。此期的江南城市,就区域空间格局而言,发展重心向太湖流域北部转移,苏州取代杭州成为区域城市体系的核心。清康熙时人沈寓在《治苏》一文中说:“东南财赋,姑苏最重;东南水利,姑苏最要;东南人士,姑苏最盛。”^② 19 世纪前期曾到过苏州的法国人耶德,在所著《成物讲解》一书中更是推誉该城是“世界最大的都市”和“江南茶丝之邦的首府”。就基本形态而言,则属于宋元变革的延续和完善,而且由于自身固有局限的日益突出和封建统治的全面僵化,显得缺乏进一步跃升的活力,面临又一个新的重大转折。相对而言,这一时期江南市镇的发展呈现出空前的兴盛。不仅数量显著增加,个体规模不断扩大,区域网络体系日趋完善,而且市镇经济专业化特色明显,居民结构更加复杂,文化和生活异常发达。特别是在环太湖地区,市镇社会的城市化进程基本完成。^③

晚清以降,江南城市经历了曲折的近代化进程。上海的快速崛起,不仅标志着江南城市发展地域重心的全面东移,也代表了江南城市由封闭转向开放、由传统走向近代的重大变革。但这种变革是在外力冲击下发生的,是一个被动的过程。如果说整个江南社会的近代转型是不自主的,在很大程度上属于非正常的,那么江南城市的近代转型同样也不是其历史发

① 参见陈国灿《江南地区农村城市化历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79—82 页。

② 贺长龄编:《清经世文编》卷二三,清光绪思补楼重校本。

③ 有关这方面的讨论,参见陈国灿《中国古代江南城市化研究》第五章,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236—270 页。

展的自然结果，因而呈现“半截子”近代化的特点。这种状况，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三

围绕江南城市与社会的研究，既有区域意义，亦有全国意义。就前者而言，城市的发展是江南区域文明演进的一个缩影，反映了江南社会的内在传统和独特道路。江南地区古代城市的萌芽是原始稻作文明的产物，春秋至汉唐江南城市的产生和发展是区域开发不断深入的结果，宋代以降江南城市的兴盛是全国经济和文化重心南移的反映，近现代江南城市率先走上近代道路显示了江南地区在近现代中西文明碰撞和交流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当代江南城市的全面飞跃则代表了区域社会现代化的成功范式。就后者而言，江南地区是中国城市发展演变的典型“样本”。原始时代的良渚古城代表了古代城市源起的萌芽形态，先秦时期的吴、越都城代表了古代城市的产生形态，六朝时期的建康代表了古代郡县城市的早期形态，宋元时期的杭州代表了古代城市的调整形态，明清时期的苏州代表了古代城市的成熟形态，晚清以降的上海代表了近代城市的发展形态，当代的长三角城市群则代表了城市的现代化形态。

从中外学界已有的相关研究来看，可以说已取得了不少成果。概括起来，主要有三方面：

一是长时段研究。如（日）岸俊南编《中国江南的都城遗址》（京都同朋舍，1985年），王卫平《吴文化与江南社会研究》（群言出版社，2005年），张忠民《江南地区的“口岸”变迁：公元750—1840年》（《学术月刊》2010年第12期），梅新林、陈国灿主编《江南城市化进程与文化转型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陈国灿《中国古代江南城市化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年）、《江南农村城市化历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浙江城镇发展史》（杭州出版社，2008年），吴锡标、陈国灿《古代江南城镇发展与社会演变研究》（西泠印社出版社，2005年），陈国灿、奚建华《浙江古代城镇史》（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年），龙登高《江南市场史》（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傅崇兰《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宗菊如、周解清主编《中国太湖史》（中华书局，1999年），臧知非、沈华、高婷婷《周秦汉魏吴地社会发展研究》（群言出版社，2007年），李伯重《多角

度看江南经济史》(北京三联出版社, 2003 年)等。

二是断代研究。这方面, 具体涉及先秦、汉唐、宋元、明清、近代以降等几个时段。

1. 先秦时期。如曲英杰《长江古城址》(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4 年), 张驰《长江中下游地区史前聚落研究》(文物出版社, 2003 年), 郑建明《环境、适应与社会复杂化——环太湖与宁绍地区史前文化演变》(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8 年), 方杰主编《越国文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8 年)等。

2. 汉唐时期。如黄今言主编《秦汉江南经济述略》(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范志军《东汉江南经济发展探讨》(郑州大学硕士论文, 2002 年), 刘淑芬《六朝的城市与社会》(台湾学生书局, 1992 年), 卢海鸣《六朝都城》(南京出版社, 2002 年), 贺云翱《六朝瓦当与六朝都城》(文物出版社, 2005 年), 许辉、蒋福亚《六朝经济史》(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3 年), 范金民、胡阿祥主编《江南社会(六朝隋唐卷)》(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6 年), (日)中村圭尔《六朝江南地域史研究》(东京汲古书院, 2006 年), 张剑光《唐五代江南工商业布局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3 年), 陈勇《唐代长江下游经济发展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 郑学檬《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 (岳麓书社, 2003 年)等。

3. 宋元时期。如陈国灿《宋代江南城市研究》(中华书局, 2002 年)、《南宋城镇史》(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梁庚尧《南宋的市镇》(《汉学研究》第3卷第2期, 1985 年12月), 范金民、高荣盛主编《江南社会(宋元卷)》(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6 年), 龙登高《宋代东南市场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 1994 年), (日)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等。

4. 明清时期。如王卫平《明清时期江南社会史》(群言出版社, 2006 年), (美)林达·约翰逊主编《帝国晚期的江南城市》(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 刘天振《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商业出版与文化传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年), 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年), 樊树志《江南市镇: 传统的变革》(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陈学文《清明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群言出版社, 1993 年), (日)川勝守《明清江南市镇社会史研究——空間と社會

形成の歴史學》(日本东京汲古书院, 1999年), (日) 森正夫《江南市镇研究——历史学与地理学的结合》(日本名古屋大学出版会, 1992年), 安涛《中心与边缘: 明清以来江南市镇经济社会转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年), 范金民主编《江南社会(明清卷)》(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6年), 冯贤亮《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年), 陈江《明代中后期的江南社会与社会生活》(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6年), 冯贤亮《太湖平原的环境刻画与城乡变迁(1368—1912)》(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年), 吴建华《明清江南人口社会史研究》(群言出版社, 2005年), 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年), 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年), 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8年), 张海英《明清江南商品流通与市场体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年), 蒋兆武《明清杭嘉湖社会经济史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8年)等。

5. 近代以降。如茅家琦等《横看成岭侧成峰: 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3年), 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年), 李家鸿主编《中国城镇(浙江卷)》(中国城市出版社, 1991年), 马裕祥、毛必林《浙江城市》(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2年), 包伟民主编《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知识出版社, 1998年版) 李学功《南浔现象——晚清民国江南市镇变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年), 李国祁《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 闽浙台地区, 1860—1916》(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1982年), 朱小田《江南乡镇社会的近代转型》(中国商业出版社, 1997年), 马俊亚《混合与发展——江南地区传统社会经济的现代演变(1900—19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年)等。

三是个案研究。这方面, 尤以围绕南京、杭州、苏州、上海等江南地区代表性重要城市的讨论最为活跃。

1. 南京。如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南京通史》(南京出版社, 2009—2013年), 吕华清主编《南京港史》(人民交通出版社, 1989年), 蒋赞初《南京史话》(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5年), 茅家琦主编《南京经济史》(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 1996年), 郭黎安《六朝建康》(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2002年), 薛政超《五代金陵史研究》(中央编译出版

社, 2011 年), 朱偰(《金陵古迹图考》(中华书局, 2006 年), (美) 牟复礼《明初南京城的变迁(1350—1400)》(台《明史研究专刊》第 7 辑, 1984 年), 杨国庆《明代南京城墙》(南京出版社, 2002 年), 王云骏《民国南京城市社会管理》(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1 年)。

2. 杭州。如周峰主编《南北朝前古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隋唐名郡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7 年), 《南宋京城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7 年)、《元明清名城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7 年), 吴振华主编《杭州港史》(人民交通出版社, 1989 年), 全汉昇《南宋杭州的消费与外地商品之输入》(《中央研究院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7 本第 1 分, 1936 年), 林正秋《南宋都城临安》(西泠印社, 1986 年), 何王芳《民国时期杭州城市社会生活研究》(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6 年) 等。

3. 苏州。如吴奈夫《先秦时代吴国都城的盛衰与变迁》(《苏州大学学报》1985 年第 4 期), 林华东《苏州吴国都城探研》(《南方文物》1992 年第 2 期), 阎立鼎《六朝时期苏州述略》(《苏州大学学报》1988 年第 1 期), (日) 砺波护《唐宋时代的苏州》(收入梅原郁编《中国近世的都市文化》, 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1984 年), (日) 伊原弘《江南都市形态的变迁——宋平江图的解剖》(收入《宋代史研究会报告第一集》, 东京汲古书院, 1983 年), (美) 迈克尔·马默《人间天堂: 苏州的崛起, 1127—1550》(收入林达·约翰逊主编《帝国晚期江南的城市》,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 王卫平《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史研究: 以苏州为中心》(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罗仑主编《苏州地区社会经济史(明清卷)》(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年), 王正华《乾隆朝苏州城市图像: 政治权力、文化消费与地景塑造》(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集刊》第 50 期, 2005 年 12 月), 赖惠敏《苏州的东洋货与市民生活(1736—1795)》(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集刊》第 63 期, 2009 年 3 月), 张海林《苏州早期城市现代化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 等。

(4) 上海。如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唐振常主编《上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 年), 王曾瑜《宋代的上海》(《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3 年第 1 期), 刘惠吾编《上海近代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7 年), 罗苏文《近代上海都市社会与

生活》(中华书局,2006年),丁日初《上海近代经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美)林达·约翰逊《上海:一个正在崛起的江南港口城市》(收入《帝国晚期江南的城市》,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840—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戴鞍钢《港口·城市·腹地——上海与长江流域经济关系的历史考察(1843—1913)》(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等。

总得看来,中外学界围绕江南城市与社会的研究,呈现出五个特点:一是以宋代以降为主,宋代以前研究较为薄弱;二是市镇研究较为深入,城市研究相对不够系统;三是城市个案研究活跃,区域研究相对单薄;四是现象描述性研究较多,理论分析相对较少;五是重视历史学的考察与分析,多学科的综合分析有所忽视。

应该说,对江南区域城市和社会的研究既需要有坚实的资料基础和实证剖析,也需要立体化的多视角透视和综合性跨学科思考。本《丛书》的研究,重在将江南城市演进与区域社会发展结合起来,由城市看江南社会发展道路,由社会看江南城市演进模式,基于江南而又超越江南,努力使江南文化研究在不断深化的同时,有所突破,有所创新。

由于《丛书》出于众人之手,各著作陆续推出,难免会存在不少缺憾和不足。若有未能臻于读者要求之处,敬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是为序。

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

梅新林 陈国灿

2013年11月

序

唐五代是中古经济发展的一个繁盛时期，研究这一阶段的经济运行方式和经济发展水平，对中国古代经济史具有较高的学术意义。

一个时代的经济发展，总有不少规律性的东西可以寻找，又能发现很多特殊性的内容，这是我们在研究中国古代经济史的过程中应该特别加以观照的。经历了六朝的初步开发，至唐五代，江南经济显示出了强劲的上升潜力，与全国各地发生了广泛的经济文化联系，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中唐以后，经历了安史之乱后的北方经济日渐衰落，而江南在稍稍动荡后，农业、工商业继续向前发展，江南几乎成为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在财政收入中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江南经济的如此表现，是否意味着江南各个地区都是同步达到这种经济发展状态的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唐代江南各州经济发展的快慢速度并不一致，发展水平有高有低，产业各有特色，各州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以润州为例。

润州处于六朝以来政治的核心地带，农业开发较早，水利建设比较兴盛，耕地质量较高，随着唐五代农田水利建设的继续加强，粮食作物的种植就与附近的苏、常地区连成一片，成为南方粮食生产最为重要的地区。润州在纺织业、金银器制造业和造船业等方面较有特色，工艺水平较高。手工业不但唐前期就有相当高的水准，而且技术含量领先于南方其他地区，是南方手工业发展的代表。润州位于江南运河的北端，既是军事重镇，又是漕运关键，是江浙地区粮食和各类物资北运的重要集散地。处在这样重要的水陆交通路线的节点上，润州作为两浙地区交通枢纽的地位就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由润州渡江，经扬州、楚州、泗州，循运河可以到达汴州、洛阳和长安，与中原、关内相连。开元八年置十道按察使，江南东道按察使之所以能设在润州，以及此后江南东道一分为二，润州成为浙西观察使的治所，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政府对润州交通地位重要性的认可。然而，润州的交通货运业却是一种依赖型的模式，它必须仰仗扬州及扬州

以北运河的畅通,仰仗北方中原地区社会不出现大的动乱。唐代后期,藩镇动乱不断,漕运线不时被切断,润州以运输促经济的发展模式受到了冲击。所以,在唐末至五代,杨行密和朱温交恶,北上的线路完全阻断,润州的经济中心地位渐渐地被分割,向西南进入岭南、福建和向东与海外交通的中心移到了杭州,沿长江西进和向北通中原的作用随着金陵的崛起又为金陵所取代。润州在唐后期表现的政治和军事作用实际上超过了经济上的作用,润州江南北部经济中心的地位逐渐让位给了苏州。润州经济发展的这种消长路线,与其他各州完全不同。

江南各州经济发展的这种差异性,在苏州表现得尤为明显。今天我们看到刘丽女士的《7—10 世纪苏州发展研究》,就是对这种差异性的具体而又深入的探讨。在书中,她以唐代宗大历十三年苏州升为雄州为切入点,在对整个唐代前后期江南户口变动规律的分析后发现:唐前期人口分布稀疏、农业经济整体发展比较一般的苏州,在中唐以后成为江南经济发展最快的一个区域,人口突破 10 万户,成为唐王朝最为重要的财赋州之一。那么,促使苏州进入较快发展轨迹的原因是什么呢?作者抓住了两大线索,一是中唐太湖东部低乡圩田系统的建成,促使苏州耕地规模向广度拓展,而以江东犁为代表的生产工具改进则标志着苏州稻作农业向深度迈进,经济的崛起使苏州成为江南第一雄州。二是苏州中唐以后的崛起与社会秩序的稳定有很大关系。历史时期促使苏州社会稳定的因素很多,其中士族文化作用巨大。唐前期传统的地方大族文化在稳定江东秩序上发挥着强大的影响力。中晚唐以后,在精干良吏的治理下,苏州社会局势继续保持稳定。上述因素,促使苏州成为江南的经济重地,江南的人文渊薮。

在书中,新观点新论述迭现。如太湖东部地区塘浦圩田系统的建成与稻作农业的关系、元和户的性質、江南第一雄州崛起的原因、唐五代苏州赋税的数量、科举制与吴郡大族的关系、南下士族对苏州的治理等。这些问题一方面紧紧抓住了苏州经济的发展脉络,另一方面又是在江南的大背景下展开的探讨,充分地展现了江南经济发展的多样性和苏州发展的独特性。这些是我们以往的研究中特别缺乏,或者说做得较为不足的地方。因此,我认为该书具有较为可喜的学术价值,所提出的一些富有启发性的意见,一定会引起学界的重视,必将推进唐代经济史和江南地方史的研究。

当然,学术研究从来就是一个不断探索不断完善的过程,我们对一些问题的研究从提出到论证都是在不断深入,并逐渐走向正确的方向。该论

著不可能达到完满，更不可能无懈可击，书中观点可商可议之处应该还有不少，一些提法和用词离“十分恰当”也有一定的距离。但学术贵在选题的拓展，贵在论述的新颖和论题的推进，而作者在这些方面做得非常出色，对学术的探索精神值得充分肯定。

刘丽大学毕业后曾在中学任教数年，2005年辞职到上海读书，在史学史、历史文献学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之后又攻读博士学位，继续在唐史及相关领域内进行不懈探索，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我作为她的导师，和她相处6年，对她的学业和学术探索精神，以及养成的学术创新精神，是十分满意的。她毕业后到山西师范大学工作，继续以敏锐的目光进行着学术研究，时常用通信的方式与我进行学术探讨。我想，以本书的出版为契机，她的学术研究定会继续深入进行，通过刻苦努力，定能不断开拓学术研究新领域，取得更大的成绩。

张剑光

2012年9月21日